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斯诺作为新闻教师的素质结构

时间: 2005-6-28 16:10:33 来源: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 杨东伶 阅读1414次

发稿: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 杨东伶

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研究生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241号

邮编: 300074

摘要: 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他为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把对中国深情的热爱凝结在“我爱中国”这句简短的话语之中。他是一个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和人民的友好使者。纵观斯诺的一生, 他不仅具有以上的头衔, 他还做过燕京大学的讲师, 作为新闻系的教师, 斯诺的素质结构是一种优化的组合。文章以斯诺在燕京大学两年教师生活为背景, 从道德品质、知识结构、智能素质三方面分析斯诺作为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优化组合”的表现, 希望对当前的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素质结构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埃德加·斯诺 素质结构 智能结构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来到中国, 游历大半个中国。1936年进入陕北采访, 写出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介绍给了世界, 成为享誉世界的记者。1941年离开中国, 在中国停留了十三年。此后在1960年、1964年、1970年先后三次来中国进行访问。斯诺的一生写了如:《远东前线》、《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等11部著作。斯诺逝世三十多个年头了, 北大的未名湖畔埋葬着他的骨灰。就如他的夫人所说:“我的丈夫在他的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 并表示, 他在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 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留在中国。现在我正是把这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古老土地下, 安放在中国新人中间, 在这里, 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里, 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他过去在北京大学教过青年, 现在他安息在北京大学, 而这里另外的一些青年正享受着前辈学生的牺牲与斗争的成果。愿现在和将来到这里来的各国青年本着给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带来解放的同样的精神来利用这块土地——在这里休息、游玩、学习和劳动, 这将是 he 希望的。”[1]

斯诺在旧中国十三年, 曾经有两年居住、工作、生活在海淀和燕园。斯诺对燕园寄托着深沉的爱。这里截取了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生活为背景, 结合他对进步学生的影响, 分析他作为一名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时至今日, 斯诺作为一名新闻系教师的魅力仍然散发着光彩, 值得我们去学习。美国的彼得·G贝德在《我为什么选择教师》一文中说:“学生的成才是教师不停息的创造工作的结果。雕塑家虽然能将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 但毕竟只是泥塑而

- 毛泽东的新闻宣传思想
- 陈独秀的报人生涯
- 郑观应的新闻思想
- 严复的新闻思想
- 康有为的新闻思想
- 谁能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
- 重提以新闻记者终其身
-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
- 论张闻天新闻宣传思想
- 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
- 瞿秋白杂文的“亮点”...

己。教师则能赋予这些泥塑以生命。”[2]教师的根本任务在于教书育人，教师的劳动是创造人才的过程。这种创造人才的过程实际上是教师履行职责和使命的过程：即教师运用自己的品德、知识、智能、行为以及环境等因素影响学生成长，提高学生素质的过程。因此教师的素质结构是适应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养合格劳动者和人才需要各种素质的最优化的组合。这一素质结构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具体到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具有一般教师素质共同特征外，又有其独特的地方。以下将从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素质、智能素质分析斯诺当年作为新闻系教师的素质结构，时代素质优化组合在斯诺这里是如何体现的。

一、人道主义精神，斯诺思想的闪光点

古人云：“一年之际莫如树谷，十年之际莫如树林，终身之际莫如树人。”教育的重要性不需阐发，因此对教育者的要求也就越高。教育家乌申基说过一句话：教师的个人范例，对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师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对教师思想品质的要求是极高的。斯诺在旧中国的十三年，正是国民党独裁专政，围剿红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际法西斯实力猖獗的时候。作为一名美国人，斯诺身上人道主义的品质是时代最崇高、最伟大的品质。从1928年来中国到陕北之前斯诺一直从事新闻实践活动，包括他在燕京大学作讲师的这段时间。八年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从1933年开始的“新闻工作与学术研究兼半的生活”，[3]“人道主义精神”贯穿斯诺所从事的活动始终。这种精神是作为一位教师时代品质的最高体现，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深切的热爱着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呐喊。斯诺从人道主义出发，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深入观察，深入了解，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使他倾向于左翼文化和学生运动，也是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者。

1928年7月，斯诺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一下船，斯诺立即去找《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为他写的一封信叫交给了鲍威尔。鲍威尔欣然接受了斯诺，并在他的“上海就是中国”的论调中，斯诺开始了他计划6周的中国之行，可是这一呆就是十三年。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初期受到鲍威尔的影响倾向国民党，认为它能拯救中国。可是1928年底到1929年上半年的中国铁路沿线的旅行采访，特别是西北萨拉奇之行使他掀开了黑暗旧中国重重帷幕的一角，这是他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开始。

就像他在《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文章里，斯诺用异常压抑的情感，沉重的笔触集中报道陷于饥荒绝境的人们，坐地倒毙的孩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衣不蔽体的妇女……。斯诺把自己的感受和那些濒于死亡的人们交融在一起。“我来到戈壁大沙漠以南的城镇萨拉奇。在这里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五百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的觉醒点，这种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4]斯诺惊骇于眼前人性被侵害、被摧残以至灭绝的可怕现实。斯诺来找寻“东方魅力”，萨拉奇之行以前主要停留在上海，曾错误的认为上海就是整个中国的情况。目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巨大不幸，彻底唤醒了他内心巨大的冲动。他指出“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概置若罔闻，与世隔绝”。“当叼着雪茄、出入夜总会的传教士为他们的儿女操办豪华婚宴时，在数百英里以外的大西北，两千万中国人正在渴望得到拯救——他们并非想通过‘圣餐之路到达天国’——他们所祈求的仅仅是每天一点点粗粮充饥……”。[5]

萨拉奇之行使斯诺懂得，呆在上海决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因此在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他又在中国等地进行了第二次大旅行，真正的当了一名“游历记者”。在这次旅行中，斯诺真正走入中国的社会的内部，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中部、东南部、南部以及人迹罕至的西南边陲，他有意识的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观察、认识中国现状。从蒋冯阎中原大战到台湾殖民地，从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狱中女囚到备受虐待致残的锡矿童工；从公开贩卖人口的“集市贸易”到吞噬无数生命巨大洪灾……一幕幕的场面，一个个的人物，无不打上“中国”的印记留在了斯诺的头脑之中。1931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斯诺在现场采访报道中沉痛的写

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被活埋在泥沙里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九十万中国人民的身上。这次打击是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6]斯诺看到孙中山生前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地广州，也仍然是无耻的贿赂，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非法的监禁和冤狱。在斯诺眼中国国民党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蒋介石政府是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这种印象彻底打破了。在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与日俱增。1932年，他在一篇文章里深切感人的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的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他们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7]斯诺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遭受的苦难，并痛切的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可怕的现状。斯诺赞成三民主义，希望在中国看到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

在《远东前线》这本书中，斯诺以大量直接经历的事件为素材，详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他目睹了大片中国土地横遭侵略者铁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炮火下丧生，城镇夷为平地，房屋烧毁，残缺不全的尸体，凄厉哭号的孤儿……在这种生活中，斯诺把自己真挚深厚的感情倾注在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身上，痛其所痛，憎其所憎，并逐渐经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交融在一起。无论在旅途中、在战场上，他基本的着眼点，始终的那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士兵、妇女、老幼。他对中国各方面的认识感受，直接来源于与普通百姓的密切接触，以及对他们所遭受命运的关注。斯诺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凝结在他的《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中国人请走后门》、《在上海的美国人》、《中国洪水末记》等文章和《远东前线》这本书中。

人道主义精神贯穿斯诺一生活动的始终，以上介绍他游历中国关于饥荒、洪水、战争的报道，以文写意，人文主义精神是他的报道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位在华的外国记者。作为一位美国人，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报道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无疑是时代最需要、最高贵的品质，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倍受青年学生的爱戴。青年学生愿意和他交流，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参加到学生活动中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他，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二、特有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媒体经验

教师应当具备远远高于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需拥有一桶水。的确教师只有拥有丰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教学中高屋建瓴、游刃有余，更好地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斯诺在三十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等课程对当时的学生如萧乾、陈翰伯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所当时被称为远东方面最新式而设备最完全的新闻学校里，斯诺将现代的新闻教育带到了这里。斯诺作为新闻系教师，他的专业素质无疑是最高的，知识结构最合理的。

1、教育经历和知识结构。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3年，在堪萨斯西港中学毕业；1923年——1925年，在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学习；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任《堪萨斯星报》校内通讯员。[8]这张表勾勒了斯诺来中国前的主要经历，他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接受了现代的新闻教育。1926年——1927年，斯诺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并担任《堪萨斯星报》的通讯员。他潜心攻读新闻学课程，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而且广交朋友，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后来斯诺在纽约的司克威维尔兄弟的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同时，还自费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学习，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1908年，富有经验的美国报人华尔特·威斯廉创办了美国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该学院的新闻专业教育在美国首屈一指，曾经培养了许多驰名世界的记者。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习，美国的新闻

传统深入到他的观念中。学院倡导的职业新闻工作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报道要持客观态度的精神对斯诺未来的新闻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诺认为，他在新闻学院连续一、两个阶段的苦读，对他大有裨益。”[9]从斯诺接受的教育，我们看到上面谈到的斯诺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

谈到教育，不光只有学校，还有家庭和社会。斯诺出生在美国堪萨斯成一个小出版商家庭。他的父亲不信仰天主教，并向他的孩子灌输反天主教的思想，教育他们怀疑上帝的存在，摆脱对上帝的迷信，抛弃“永受惩罚”教义的禁锢。斯诺回忆说：“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都注重理性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10]这种怀疑精神以及作为密苏里人的“眼见为实”的习惯，斯诺将他们带到了燕京大学的课堂上，将这种精神贯穿到学生学习新闻写作的过程中。

斯诺的知识结构是斯诺成为一位有影响新闻系教师的基础。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习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所不能比拟的。丰厚的新闻学知识使斯诺在新闻系课堂上讲课游刃有余。此外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从斯诺1936年下去陕北之前所写的著作和文章中，可以看到它的知识结构的主要成分有：“对远东政治局势的了解，对日本侵华背景的了解，对西方个列强的了解，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了解，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对中文的了解，对国民党的了解，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1]

斯诺特有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同他个人爱好学习有关，此外也是中国人民对它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人民众的最优秀的代表，鲁迅和宋庆龄。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写道：“先生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社会工作。但要永远思考和研究。’”[12]也就是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斯诺深入中国的现实，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它的知识结构。1933年以后在北京的斯诺过着新闻与研究兼半的生活，他把精力集中于如饥似渴寻求真理和知识上。在燕园的这两年是他的知识结构日趋完善的两年，作为新闻系讲师，他不光具有新闻记者所要求的知识，还有作为学者的“专”，这些特征更体现了新闻业对人才需求的“杂家”特征。教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人才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最有优化的组合。无疑斯诺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不仅仅适应了旧中国三十年代新闻行业的需求，在当今新闻院系教师素质中也是凤毛麟角。

2、多年媒体经历，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斯诺最早的新闻经验应该是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时，担任《堪萨斯星报》校内通讯员。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从此就开始了在中国新闻记者生涯，即使在燕京大学作讲师，从事新闻工作也仍然是他的主业。1928年9月到1936年6月去陕北革命根据地前，斯诺的媒体经历如下：1928年9月——1930年3月，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代理编辑等职，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7月——1933年，任美国统一报业协会驻远东旅游记者，驻北平代表；1933年，开始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撰稿；1932年——1941年，任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1934年——1937年任美国《纽约太阳报》特约记者。为多家媒体工作，多年媒体经验，对于新闻系教师是难能可贵的经验。斯诺在1928年——1929年，在旧中国的铁路沿线（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线）旅行采访，著名的《拯救二十万生灵》就是在这次的旅行采访中完成的。1930年7月——1931年9月，斯诺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第二次旅行采访，使斯诺加深了对蒋介石领导下国民政府的认识。1938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从九·一八开始，斯诺密切关注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动向。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到过东北、上海、热河等战事的发生地，现场目击略者的罪行。1932年1月28日的午夜，日军突袭上海闸北。斯诺在整个战争中，深入各界采访，亲眼目睹了上海各界中国人的热烈反应：19路军的英勇抵抗，上海中国商会经济资助，各种工商组织团体捐款支援抗日军队……斯诺亲

历战争进行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

游历记者的生活，富于讲故事的手法，斯诺写了多篇通讯文章，如《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中国洪水末记》等，以及根据几年游历生活，对中国社会日益深入观察了解，思想感情与中国人民结合凝结成的《远东前线》这本书。这些实战经验是新闻系教师宝贵财富，是任何在书斋里的教师研究不出来的。新闻专业课程的讲授，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三、合的智能素质

优秀的教师，必然是严谨治学，锐意进取的教师。为了教书育人的需要，自觉积极而又坚持不懈的更新和发展自己的素质，以提高教育质量。在这一方面，斯诺是个表率，为了更好的与中国学生的交往，努力学习汉字和中文，为了了解学生，斯诺深入的学习中国的现代文学。但里谈的教师的智能素质，主要是指，教师自觉遵循教育规律，用科学的办法培养训练学生。这种素质是教师工作创造性的最好表现。拥有同样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的人，教授同样的学生、同样的课程，教育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甚至是大相径庭。这里就存在一个教育方式的问题，教师的智能素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式的变革上。教师的劳动，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空间上具有广延性。课内课外，班上班下都是教师的劳动时间，课堂上、操场上都可能使教师的工作地点。因此，教师要用自己的知识、能力等对学生施加影响，言传身教，这才是对教师教育能力和教育技巧的考察。

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要讲授“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等课程，他采用了一种互动式教学。在中国几千年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中，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师徒如父子”的观念深植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斯诺的互动式教学，给当时中国教育界吹来了一股清风，时隔多年人们也不曾忘却。在张文定的《斯诺在燕园》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记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有学问的教师。他第一天来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讲学，而是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学生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用启发式教育。”[13]就是利用这种教学方式斯诺把他在新闻学院学到的新闻知识和纪念游历记者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了燕大的学生。“这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但斯诺先生在班上所讲关于报刊特写和报告文学的写作特点，我至今记忆犹新。”[14]这也许是对斯诺教育效果最好的实证了。

教师的智能素质除了采用独特的教育方式外，还表现在指导学生的能力和优化师生关系上。教师不仅能引导学生增进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还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正确的指导。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两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黑暗之中，蒋介石郑政府的独裁反共，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前沿的中国大学生无疑是最充满了热情、最敏感的群体。斯诺几年的游历生涯使他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外国记者。张兆麟曾经是斯诺的学生，为了得知当时华北的形势真相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情况，他访问了斯诺夫妇，后来燕京大学王汝梅（黄华）、陈翰伯等也常去斯诺的家。斯诺将其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们。“斯诺夫妇没有当时一般白人的那种优越感，总是以朋友式的亲切态度与我们交谈或争论问题。”[15]斯诺与学生的关系是朋友式的，他们是平等的，这种关系使得同学们更容易受到斯诺的影响。

斯诺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一二·九运动前，斯诺就帮助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国外的报刊上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斯诺夫妇加入到同学们中间讨论如何行动并提供了一些建议。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援，斯诺有意的把青年学生介绍给外国友好人士如史末特莱、《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德国经济学家韦特福格尔夫妇等人。另外斯诺还满热情的参加了一二·九、一二·六的两次示威游行，斯诺和其他的西方记者跟着学生的队伍进行采访，将一二·九学生运动跨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越过高山和海洋传到了全世界，这极大的鼓舞了青年学生。

回顾斯诺在燕园的岁月，对他作为新闻系教师素质结构分析，希望对现代新闻教育提供借鉴。新闻院系教师不仅仅应当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媒体经验，更重要的是与独特的教育方式相结合，就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学入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知识、见识与才能的组合，希望斯诺拥有的素质结构能够与时俱进，现代新闻院系教师努力改善自己的素质结构，学习斯诺适应时代的需求，为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新闻人才服务。

注释：

- [1]新华社关于北京斯诺骨灰安葬仪式的报道》，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斯诺在中国》，袁可安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北京，第422页
- [2]引自《教育传播学》，邵培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 [3]《斯诺文集》1卷，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南、克雄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重庆，《复始之旅》，第152页
- [4]同上，第2页
- [5]《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国信使》，1930年8月，《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326页
- [6]《斯诺陕北之行前的思想发展》，崔维征，《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421页
- [7]同上，第426页
- [8]《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515页
- [9]《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267页，玛丽·希斯科特，《斯诺教育了我们》，原载美国《大学评论》，1972年4月
- [10]同[3]，第15页
- [11]《斯诺的成功之路——从<西行漫记>看斯诺成功的内外因素》，《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
- [12]《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479页
- [13]《斯诺在燕园》，张文定，《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134页，原载《新时期》1980年第3期
- [14]《斯诺先生叫我们怎样写作》，黎秀石，《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140页
- [15]《埃德加·斯诺，我的良师益友》，张兆麟，《纪念埃德加·斯诺》，刘立群主编，新出版社，1984年，重庆，第124页

文章管理: [mycddc](#) (共计 4291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斯诺](#)

- [“斯诺百年”中国传媒人的思考 \(2005-8-11\)](#)
- [呼唤更多的“斯诺式”的记者诞生 \(2005-7-20\)](#)
- [斯诺谈65、70年两次会见毛泽东 \(2004-4-15\)](#)
- [从“密苏里州人”到“世界公民”——解读埃德加·斯诺 \(2003-9-7\)](#)

[>>更多](#)

← [斯诺作为新闻教师的素质结构](#)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投稿信箱◆会员注册◆版权声明◆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 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 追究法律责任.